



□ 陈瑞生

我和母亲与中央党校的情缘

我在中央党校工作了16年，现在是一名党校退休人员。我的母亲彭儒在中央苏区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都到过党校学习，是中央党校创建时期的首届学员。我们母子与中央党校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在瑞金叶坪洋溪村举办了开学典礼。这一天被作为中央党校的誕生日记载在党校历史上。刚开始办学的中央党校设有初级、中级和高级训练班3个班。我母亲编在高级训练班的妇女小组，学员主要是苏区各省委、苏维埃政府和工会选送的干部，和她同一个组的还有李贞、邱会玉、贺怡等人。学制6个月。

我母亲生于1913年3月6日。她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那一年正好20岁。母亲是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迎春镇碣石村人，1926年上衡阳女三师，和进步的同学一起闹革命。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女战士之一，也是坚守井冈山斗争最后一个撤离的女红军。她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那一年担任苏区中央局妇委委员、长胜县委宣传部部长。虽然当时母亲很年轻，但她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经受过战场上枪林弹雨的考验。

母亲加入革命队伍最初的几年，总是处在繁忙的工作和战斗中，一直没有机会学习。这次组织上安排她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她非常高兴，特别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她对党校的课程记忆深刻，曾对我讲，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固定教员很少，大部分课都是中央领导和各部门领导讲的。他们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任弼时、邓颖超、刘少奇、董必武等都在党校讲过课。

母亲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的时候，肚子里正怀着我。毕业不久，母亲就在那一年（1933年）的10月1日生下了我，因为出生在红都瑞金，所以取名瑞生。

1934年4月底，国民党多次空袭叶坪，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一起迁往沙洲坝，新校址在黄竹堪下新斤村，后又迁至云石山田心村。10

月，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瑞金，开始长征。10月15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部分干部和100余名学员，到沙洲坝集合，于黄昏时踏上了长征路。

我父亲陈正人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父母亲都各自肩负着党安排的革命任务，他们只好把我寄养在奶娘家里。从此我变成了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直到15年后，当年的红军终于又回到了江西的这块红土地，江西全境解放，我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母亲同邓六金、钟月华、李伯钊、吴仲廉等妇女队的骨干一起行动，在董必武带领的行军队伍里转移。她在涉水过于都河时感冒发高烧，组织上劝她返回瑞金。本来苏区中央局要我父亲留下在南方打游击，但当时他患肺病非常严重，已经无法行走，于是组织上要我父亲到上海潜伏下来治病，由我母亲陪护他。到上海后，由于形势严峻，他们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回我母亲的老家，在偏僻的小山村（碣石村）隐蔽下来。一年多后，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他们急切地打听红军队伍的消息，想尽早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

1936年12月，父亲在报纸上看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只身前往西安，找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第二年初，父母亲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延安。

1937年至1945年，母亲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科长期间，组织上安排她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到了党校后，她看到许多从前在中央苏区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老战友、老同学，高兴得欢呼雀跃。中央党校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校长毛泽东为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教她们学习的教员，还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其芳等。母亲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确实收获很大。教员讲课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听得懂、用得上，使我受用一生。在学习过程中，党校还没有体育课，开展打篮球、拔河等活动，学习生活搞得

丰富多彩。

1949年9月，我回到父母亲身边时已经16岁了。由于收养我的第二家的养母自己生了男孩子，于是我只上两年小学就辍学了，开始上山砍柴、下地干活。

1950年春，父亲送我到汉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学习。为了加紧补习文化知识，我刻苦学习，并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底，父母亲从江西调到北京工作，我们在北京安了家。1953年夏，我从子弟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在中学期间，我继续努力学习，同时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下、在父母亲的教导和鼓励下积极要求进步，于195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夏，中学毕业后，我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成为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毕业生中最早的大学生。1962年夏，我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任教。1969年底，我同妻子所在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往合肥。

粉碎“四人帮”后，母亲总希望我回到北京工作。1977年3月，中央党校要复办了，复校期间，党校请党中央以中组部的名义向全国高等院校和宣传部选调业务尖子到中央党校充实教师队伍。母亲把我的简历投给了党校。在我的心中，早就对这所党的最高学府充满了向往。

那是1977年6月的一天，正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的我突然接到中组部的调令“通知陈瑞生同志迅速到中央党校报到”，一时间激动万分，难以相信这是真的。

7月7日，我到中央党校报到后，被安排到哲学教研室工作。从此，我在哲学教研室执教11年，担任认识论组副组长、哲学教研一室副主任、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教学领导小组组长。能到中央党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我的理想。这里有许多专家学者，可谓高手如林，特别是许多中央及部委的领

导常到中央党校来作报告，使人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对于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大有裨益。教学对象绝大部分都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这对于教学相长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因此，我的业务水平很快得到提升。在中央党校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先后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以及各省市的机关报刊都发表了文章。在中央党校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专著。除了在教学上填补一些课程空白外，还与同仁一起成立中央党校妇女理论研究中心。1989年5月，我被调到进修部担任副主任，直至1993年退休。

我在中央党校工作了16年，工作调动频繁，虽然有些辛苦，但我非常快乐。党校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工作平台，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既培养了我，也使我能够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如今退休也快30年了，我深深感到中央党校是我的事业和安度晚年的最好归宿。

我的母亲彭儒，同我一样都曾经是党校人。她对中央党校怀着深深的眷恋，离休后常到我家住些时候，这是她晚年最幸福的时光：这里有她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教长成仿吾，有她在延安中央党校就认识的吴亮平，南下之前在吉林省工作过的老战友宋振庭、官敏章夫妇……

母亲高兴地看到，眼前的中央党校，不仅校园比瑞金和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漂亮得多，更主要的是，在瑞金和延安所形成的教学方针和办学的优良作风没有丢，并且随着形势变化继续发扬光大。她感到中央党校是一块净土，是培养干部的熔炉，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阵地。一到中央党校，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样，心里非常舒畅，一切都感到很亲切。

我与我的母亲对中央党校怀有共同的情感和祝愿，就是希望她的事业蒸蒸日上，为党和国家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教授）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我与中央党校



又见槐花飘香

□ 俞海云

明媚春光里，驱车回家乡。

年年花相似，岁岁意不同。路畔的田野里，麦苗初长，大豆成簇，绿意葱茏。山隘口、沟壑间、山路边，车窗外不时掠过几棵槐树，绿叶间衬着白花。风儿缓缓，又是槐花飘香时。

父亲一生勤快，喜欢栽树。小时候，房前屋后都是荒地。父亲用铁锹开垦平整，周围扎上篱笆，栽了一排刺槐。刺槐属蝶形花科落叶乔木，贫瘠的土壤也生长旺盛。槐叶和槐花可食，还可清熱解毒。相传，七仙女思凡下界，与董永桥边相遇，一见倾心，互生爱慕，指槐为媒，喜结连理，情定一生，槐树成了他俩牵线搭桥的月老，村里人都熟知这个故事，也都喜欢种槐树。

“柳花尘里暗，槐色露中光。”几年后，那排刺槐长得根深叶茂，郁郁葱葱。每到四五月间，刺槐叶子葱绿，槐花满树绽开，鲜嫩饱满，香气飘逸。这个阶段，槐花成了兄弟姊妹

们的牵念。初夏傍晚，仰望着槐花，满心喜悦，唇齿生香，充满美妙的故事。

“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饥饿的年代，缺衣少食，槐花是难得的食物。槐树高大刺多，只能用铁钩钩住树枝掰倒下来，摘下枝条上的花瓣。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很快就吃饱了。剩下的槐花用水洗净，里边放点盐巴，掺杂些玉米粉搅拌成菜团子，煮上一大锅，一人捞一碗，就是当天的主食。

夏秋时节，天气炎热，槐树下绿荫浓浓。妈妈提来小方桌放在树下，让我写作业。“好好念书，将来才有出息。”妈妈坐在旁边缝补着衣服自言自语，眼睛里露出慈爱而期盼的光芒。温和的父亲坐在树杈上抽烟喝茶，小黄狗安静地躺卧在他的脚边。

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是我曾经上的小学。小学操场边也长着一排高大粗壮的刺槐。槐花盛开时，芳香飘满

校园。记得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围在树荫下玩耍，觊觎着它的甜美。槐花越开越旺。终于盼来了老师布置的劳动课任务：让孩子们摘槐花。“呼童采槐花，落英满空庭。”男孩子用铁钩钩枝条，女孩子摘槐花，大家边摘边吃，肚子吃得饱饱的，开心极啦。

春夏年年，槐花飘香。小学毕业后，我就离开了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上学了。父母耕耘着土地，那些槐树静静地生长着。

“慈葱前人树，恩泽荫子孙。”如今回到故乡，站在槐树下，无限感喟时光流逝。40多年如白驹过隙，一闪即逝。十年前，慈厚勤劳的父亲走了；四年前，缝补衣服的妈妈也驾鹤西去。那个曾在树下歪歪扭扭写作业的小男孩已是中年。家乡也像外面的世界一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小学校舍变成一幢三层楼房，红瓦白墙，掩映在绿树中，透露出现代农村的蓬

勃生机。

槐花在风中摇曳。折几枝新鲜的槐花，白白嫩嫩、甜甜香香。那朴素纯洁的颜色和自然的甜香，夹带着几缕温馨的春风迎面拂来，提醒我不是在梦中，而是真实地站在家乡的土地上。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摘一串将开未开的花骨朵儿，将下一把塞进嘴里，一股清凉、一丝甘甜，几分馨香。生活不能没有槐花，采摘些许，不仅仅为了品尝，而是为了家乡的味道，为了那份久违的牵绊……

一路返回，月色柔美，青山依旧，槐花香浓。



金砂红色小镇位于福建省西南的龙岩市永定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风景优美、红色资源丰富，近年来成为人们追寻革命先辈足迹、接受红色教育的热门打卡地。

这里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鼎丞的故里；这里是“土地革命摇篮”——震撼八闽的永定暴动遗址所在地；这里被誉为“红军摇篮”——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队伍“溪南红军营”的诞生地；这里是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重要大站……

从永定高速公路出口，沿着山峦耸翠、绿树成荫的山谷，在宽阔的柏油路上驱车4公里，便到了金砂红色小镇。

金砂红色小镇的核心区域便是红军街。红军街呈曲尺形，前段100米左右，后段300米左右，街旁两边灯杆都插着“溪南红军营”军旗，灯杆上方为闪闪发光的五角星。走进红军街便会使人感受到金砂的革命历史，感受到金砂的美丽蝶变，感受到金砂的红色传承。

红军街里，最让人感受至深、备受教育的是张鼎丞同志故居。张鼎丞是永定金砂西田村人，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在张鼎丞同志故居的遗址上，没有房屋建筑，只是矗立着一个纪念碑和留存一段高不过3米、宽不过2米被烟火熏黑的残墙，以及一块碑文记载和一块说明牌。

1928年6月底，张鼎丞策划并指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福建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农民武装暴动——永定暴动。暴动成功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张鼎丞恨之入骨，连续3次派军队焚烧了张鼎丞家的房子，烧得仅剩下如今人们看到的被熏得发黑的一段残墙。在张鼎丞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母亲、父亲、结发妻子、弟弟等多位亲人都参加了革命，其中6位亲人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尤其是他的时任永定军事部长的弟弟，被敌人割下头颅悬于城墙示众。新中国成立后，家乡人民多次写信给张鼎丞，要求在他家的房子废墟上重建故居，他都没同意。他在给家乡人民的回信中答复道：需要作为纪念的话，现在这样子，立一个说明牌，说明原来的样子和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就很可能起到纪念的作用。

一段残墙，也是一段“初心墙”“民心墙”“廉洁墙”，一座让人景仰的丰碑！

红军街、张鼎丞同志故居遗址、永定暴动遗址、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馆、永定大站——古木督的“永昌楼”等构成了红色旧址群，到处是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

永定暴动遗址——金谷寺位于金砂镇的西湖寨。走进具有760多年历史的金谷寺，寺院屋后高高竖立着“土地革命摇篮”6个熠熠生辉的红色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发生过惊天动地的革命故事。在金谷寺的右边入口处，立着一块“永定暴动遗址——金谷寺”的石碑，道出了此处的历史事件；旁边的“永远跟党走”的群雕，再现了90多年前永定暴动场景；右边的广场摆放着退役的一辆坦克和一门榴弹炮，彰显了这里也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基地。

1928年6月29日凌晨，张鼎丞等人在这里策划并指挥了震撼八闽的永定暴动，次日4000多永定农民抬着土炮，持着步枪、鸟銃，举着长矛、大刀等围攻永定县城3天，后因久攻不下，为保存革命实力，暴动队伍撤回金谷寺，挑选了200多名骨干，组建了以张鼎丞为营长、邓子恢为党代表的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队伍溪南红军营（永定苏

风展红旗话金砂

□ 陈寿南

维埃时期金砂片称溪南区），拉开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序幕。同年8月，在金谷寺召开了溪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组建了福建省第一个区级红色政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溪南区土地法》，成立了秘书处、财政处、审判处、土地处等7个机构。永定暴动的成功，溪南红军营的组建，溪南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国土地革命的开展，积累了实践经验。

在红色小镇右侧的永定区委党校内的“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馆”里，可以看到在1930年冬至1934年10月间，从上海至瑞金这条长达3000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革命历史图文；在古木督自然村“永昌楼”红色展馆里，可以看到永定大站3年时间来向赣南中央苏区运送6000多担重要物资，护送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转移到中央苏区的重要贡献。

在红色小镇左侧的金砂溪河滨木栈道一带，可以瞻仰中国十大少年英雄长廊，其中有张锦辉纪念馆。张锦辉是永定金砂人，被群众称为“红色小歌仙”。1930年5月，她在宣传革命时不幸被捕，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年仅15岁的宝贵生命，1984年被团中央列入“中国十大少年英雄”。

金砂溪水唱英雄，红色小镇传基因。金砂红色小镇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地干部培训、学校师生研学、八方游客参观等纷至沓来……

90多年前，这里红旗处处飞舞；90多年后，这里红旗遍地飘扬。今天的红色小镇向人们讲述着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发挥着红色教育功能，鼓舞着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作者单位：福建省龙岩市委宣传部）



金砂红色小镇